

2014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战国策派”思想研究

李雪松◇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4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

“战国策派”思想研究

李雪松◇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策派”思想研究 / 李雪松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81129 - 818 - 5

I. ①战… II. ①李… III. ①思想史 - 研究 - 中国 -
民国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5957 号

“战国策派”思想研究

“ZHANGUOCEPAI” SIXIANG YANJIU

李雪松 著



责任编辑 张永生 王选宇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9
字 数 129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818 - 5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战国策派”的思想成因 / 13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13

第二节 理论来源 / 17

第三节 人生经历 / 20

第二章 “战国策派”的宇宙观 / 22

第一节 尚“力” / 22

第二节 批判德感主义 / 28

第三章 “战国策派”的伦理观 / 32

第一节 批判大家族制 / 32

第二节 “忠为第一”的政治化伦理 / 35

第三节 “英雄崇拜” / 37

第四节 国民性改造 / 44

第四章 “战国策派”的文化观 / 49

第一节 文化形态史观 / 49

第二节 “战国时代”的重演 / 56

第三节 中国文化独具“两周”论 / 60

第四节 “文化重建”第三周 / 68

第五章 “战国策派”的政治观 / 72

第一节 批判官僚传统 / 72

第二节 “士”的蜕变 / 76

第三节 “由大夫士到士大夫” / 79

第四节 无兵的文化 / 82

第五节 民主与集权 / 87



第六章 思想定位及评价 / 92

第一节 历史定位 / 92

第二节 分析评价 / 96

结 语 / 102

参考文献 / 103

附录一 《战国策》目录 / 117

附录二 “战国策派”学人主要著述目录 / 122

附录三 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史观 / 131

后 记 / 140

导 论

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政治、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向逐渐成为人文学科探讨的焦点,更是世人关注的热点。其间,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必须大量接受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因为西方社会的经验也是人类文明共有的财富。但也有学者认为,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已经开始显露出它的诸多弊端,21 世纪将是以“天人合一”为核心观念的东方文化主导的时代。实际上,我们要想准确地把握 21 世纪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走向,就必须首先认识和把握 20 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发展轨迹。当我们把视野拉回到 20 世纪关于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性质的争论上时,“战国策派”学人以重建中国文化为出发点的各种理论就不得被提起。如果能够读懂它们,实际上也就为读懂 20 世纪中国知识群体的心态提供了一个视角。

一、研究的对象

“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兴起的一个学术派别,又称“战国派”(本书以后一律称作“战国策派”),因其主办的《战国策》、《大公报·战国副刊》以及“战国时代的重演”的主张而得名。《战国策》是由云南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 年解散)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在昆明主办的半月刊,自 1940 年 4 月 1 日至 1941 年 7 月 20 日,共出版 17 期;另有上海版的月刊,自 1941 年 1 月 15 日至 1941 年 3 月 15 日,共出版 3 期。在 1941 年昆明版《战国策》半月刊停刊之后,“战国策派”学人又在重庆的《大公报》上开辟了《战国》专栏,直到 1942 年停办。除此之外,《今日评论》、《民族文学》和《军事

与政治》等刊物也是“战国策派”的主要学术阵地。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主张文化形态史观,抨击官僚传统,检讨传统伦理,强调国民性改造和中国文化重建。

在对“战国策派”的性质进行界定的时候,学者的意见往往不统一。有的学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为法西斯主义和国民党政府服务的政治团体,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十分流行的;还有的学者认为“战国策派”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以后开始流行。经过对“战国策派”诸多文章的阅读和分析,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战国策派”并不拥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与章程,对自己的主张也没有明确的划分,只是在它的代发刊词上有一段范围宏大而模糊的声明:“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及‘尚力政治’、‘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如一‘交响曲’以‘大政治’为‘力母题’,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①这其实更加说明了它的松散与兼容。结合以上种种,笔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抗战时期活跃在昆明、重庆等地,继承了近代以来“尚力”思潮,活用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思想,以文化重建为根本目的的松散的民族主义学术团体。

“战国策派”学人大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战争时期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注重对国家民族的思考,面对日益迫切的民族危机,他们从国家民族的现实救亡入手,进而由现实到远景,探讨民族文化重建。《战国策》和《大公报·战国副刊》这两种刊物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有几十人之多,如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佶、沈从文、洪思齐、郭岱西、贺麟、陶云逵、梁宗岱等,但他们的观点主张并不一致,所以并不能把他们都划入到“战国策派”。本书所指的“战国策派”学人主要包括林同

^① 《战国策》第2期卷首《本刊启事(代发刊词)》。

济、雷海宗、陈铨等人。

林同济,笔名耕青、独及、望沧,1906年3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他1922年由北京崇德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高等科,1926年由清华毕业公费赴美国留学,在密歇根大学专修国际关系与西方文学史,1928年获该校政治系学士学位,同年,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历史、哲学课程,主修政治学,1929年获该校政治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该校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在1930年至1932年间,曾任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米尔斯学院中国历史与文明专业讲师。在1930年至1933年间,曾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讲师。1934年回国后,先于1934年至1936年间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经济研究所教授,后于1937年至1942年间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政治学系主任,再于1942年至1945年间任复旦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1945年,他应美国国务院文化部门的邀请再度赴美进行讲学。1947年游历欧洲。1948年回国创办“海光图书馆”,后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这一时期著有《时代之波》(主编)、《文化形态史观》(与雷海宗合著)等学术著作和大量论文,还与雷海宗等人主编过《战国策》、《大公报·战国副刊》、《今日评论》。1953年因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林同济被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教书,致力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校勘与研究,讲授英国文学史、英美小说、英国戏剧、莎士比亚读评、翻译理论等课程。这一时期著有《耕青随笔》、《莎士比亚剧选》、《李贺诗歌集需要校勘》、《五卅惨案汇编》等。1980年10月2日,林同济应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之邀赴美讲学,11月20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终年74岁。^①

雷海宗,字伯伦,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永清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高等科,1922年由清华毕业公费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深造,主修历史学,副修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

^① 参见江沛. 战国策派思潮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许纪霖,李琼. 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5—404页.

历史学研究所深造,并于192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先后于1927年至1931年间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至1932年间任武汉大学史学系与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至1938年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38年至1946年间任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1946年至1952年间任清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这一时期编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国通史选读》(6册)、《文化形态史观》(与林同济合著)等学术著作和大量论文。他还与黄曝寰共同主编过《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与林同济等人主编过《战国策》、《大公报·战国副刊》、《今日评论》等,主编过《周论》(44期)等刊物。1931年,他发表了《殷周年代考》一文,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特点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952年,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这一时期他编写了《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1957年,全国开展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开展了“鸣”、“放”活动,雷海宗参加了两次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的问题。在此期间,他提出的“人类社会形态发展中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差别不大”的观点,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经典理论的“修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基本停滞不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的认识,遭到在全国点名批判,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患上慢性肾炎,不得已停止了教学活动。在病中,他还译出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重要章节。1961年,他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1962年,他抱病重新走上讲台,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在天津病逝,终年

60岁。^①

陈铨,又名大铨,别名陈正心,笔名T、唐密,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城的盐井街。他1921年由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科班,1922年入清华学校西方语言系学习。1928年毕业后赴美国奥柏林大学留学深造,1930年获得该校硕士学位,同年,赴德国基尔大学留学,1933年转至柏林大学,并完成以《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为题目的博士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先到武汉大学任教,之后于1934年至1937年间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讲师、教授,1937年至1943年间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1943年至1946年间任重庆中央政治学院英文教授兼重庆正中书局总编辑、青年书店总编辑,1946年至1952年间任上海同济大学外文系主任。这一时期他著有《中德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叔本华到尼采》、《戏剧与人生》等学术著作和大量论文,长篇小说《天问》、《革命的前一幕》、《恋爱之冲突》、《彷徨中的冷静》、《死灰》、《狂飙》等,创作了多幕剧《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黄鹤楼》和独幕剧《婚后》、《自卫》、《衣橱》等著名话剧,主编过《民族文学》杂志。1952年,他调任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从事图书资料整理和翻译工作。这一时期他著有《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翻译了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两人在边境》、沃尔夫冈·凯塞尔的《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1969年1月31日,陈铨逝世,终年66岁。^②

“战国策派”学人都是经过了欧美风雨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等文化观念的反思中,深深地感到仅仅靠“拿来”或者“打倒”是行不通的,抗战的最终目的是整个文化的革新。于

① 参见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15页。王敦书,《学贯中西 桃李天下——雷海宗先生的生平、学术成就和治学特点》,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99—311页。

② 参见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16页。季进,曾一果,《陈铨 异邦的借镜》[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185—194页。

是,他们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前提下,对被传统腐蚀和战火摧残的民族精神进行了拓展与重构。

“战国策派”力图以一种超越的目光去看待二战时期的世界形势,把战争说成是民族竞争和国力竞争,似乎并不在意战争性质的正义与非正义,但是他们根本的出发点仍在于反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在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他们认为国力的要素在于民气,而民气振发的关键在于摒弃传统文化的积弊,发掘与发扬民族历史上曾有过的能激发民气的精神酵素。战争带来了压力,更带来了危机感和紧迫感,此时重要的是借鉴 20 多年来新文化建设中的经验得失,重新寻找一种比较适合的路径。而文化重建的目的在于改造孱弱的国民性,其途径就是从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战国文化中吸取活力,同时以世界一些民族文化重建的经验作为借鉴。他们的文化重建办法比较空泛和不切实际,但是文化视野比较开阔,特别是对文化历史形态的考察,对传统文化积弊与活力的分析,对官僚制度的抨击,对传统伦理的检讨以及对中西文化的比较,都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二、研究的现状

“战国策派”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它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和主张便引发了大量的批判与赞扬,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思想文化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国内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都是从政治上的全盘否定开始,然后到政治上、学术上的猛烈批判,再到政治上的全部否定、学术上的部分肯定,再到政治上的同情、学术上的基本肯定。由此可见,对“战国策派”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与学术两个不同角度出发,政治的研究与学术的研究总是相伴相生。但从整体来看,对“战国策派”的评价是政治批判多、学理评价少,片面分析多、全面把握少,以讹传讹多、立足第一手材料的少,“战国策派”经常被视为“宣扬法西斯主义”、“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的“反动派别”。尤其是 20 世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学术界一直将“战国策派”视为敌人,认为他们是反动的,因此对他们大加批判,在各种教材和学术著作当中都将他们视作右翼。这一阶段,政治的声讨以绝对之势压倒学术

的探讨,即使有学术的探讨也不过是为政治上的反动定性来佐证。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发表的研究“战国策派”的文章来看,学者们对“战国策派”的研究不断走向理性化和全面化,不再片面地全盘否定“战国策派”的思想,都力图为“战国策派”摘掉“反动派别”的帽子,通过大量阅读史料,从学术立场上予以理性反思,还原“战国策派”的本来面目。

在20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被定性为宣扬“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并为国民党统治作理论宣传的反动派别,是与当时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背道而驰的。如《论英雄与英雄主义》(全民抗战周刊,1940,148)一文批判陈铨提出的“英雄崇拜”,认为他所崇拜的“超人”是法西斯式的英雄,是对群众独立见解的欺蒙,是反理性主义的逆流;《时代错误》一文批评“战国策派”,认为世界的发展与否决定于战争胜负的观点是法西斯主义的翻版,并质问“战国策派”究竟“是在替谁说话”;《“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群众,1942,7,1)一文首次全面否定“战国策派”的基本主张,并认定其具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认为“战国策派”是以学术之身主动跳入政治旋涡,成为鼓吹法西斯主义与国民党反动专制政府的跳梁小丑;《文艺的堕落——未完成的论文〈人生观与艺术观〉之一节》(见《关于现实主义》,何其芳著)一文认为“战国策派”的文艺创作是“特务文学兼地主文学”。这一时期对“战国策派”的评价都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学术探讨的意义相对薄弱,但是却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评判“战国策派”的基调。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结束前,由于有了抗战时期的铺垫,对“战国策派”仍停留于政治批判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在“文革”期间,“战国策派”学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学术界更加无法正视其学术价值,而是对其文化与政治主张大加挞伐,其丰富的思想主张被视为是“反对民主政治”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如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新文学史稿》和《中国新文学史初稿》;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开始重视从学术的角度对“战国策派”

进行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没有走出政治批判的阴影,仍然不能突破以前的框架和限制,所提的观点大都还是因袭前人,因而缺少特别有分量和有价值的成果。如《评“战国派”的文艺观》(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1,2)一文指责陈铨的文艺作品是在宣扬法西斯主义和美化汉奸特务,是国民党“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直接产物,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从批判的角度收集了“战国策派”的一些言论和批判“战国策派”的一些文章。《“战国派”美学思想的渊源——评〈寄语中国艺术家〉》(见《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4)认为“战国策派”宣扬权力意志,是为了达到为国民党效劳的政治目的,而其对尼采哲学的阐释是在宣扬法西斯主义,其目的是在国内反对马克思主义,为在国统区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掀起反共高潮服务。《从陈铨的作品看“战国派”的文艺观》(见《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4)一文认为“战国策派”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宣扬的是一套为国民党效劳的文艺观,而陈铨的作品是十分反动的,是反对历史唯物论、反对中国共产党、反人民的。《重评陈铨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4)一文虽然认识到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强调对“战国策派”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要进行重新评价,肯定了其作品抗日反汉奸的性质,但也可以看出仍然没有摆脱既有的政治定性的影响。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文学史或者专论仍然是在20世纪40年代政治结论的基础上对“战国策派”展开的研究,虽然有少数的研究者开始尝试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对“战国策派”进行局部的肯定,但这种肯定还是在政治上进行否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这些研究仍然存在着研究力度不足和研究深度不够的缺点,不能够设身处地地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出发挖掘其写作的初衷,形成的有关研究论文仍显分量不足。如《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明天出版社,1990)虽然指出陈铨具体的政治主张和文艺观念有错误,但是之后还是对他的艺术创作进行了肯定。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学术研究的空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拓深,对“战国策派”的研究也就有了新的变化。尽管

关于“战国策派”的学术研究仍受到历史既有的思维模式的惯性影响,但随着研究思路的调整,涌现出了一批对“战国策派”进行重新定位的研究成果。不论是对“战国策派”某个代表人物某些文化主张的具体辨析,还是对“战国策派”的整体性重评,都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对“战国策派”文化价值的整体性和多元性给予了强调,不仅在介绍上力求全面,而不是有用则用、无用则去的功利主义,而且在评价上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如郭国灿的《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约戊戌—五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率先向半个世纪以来对“战国策派”的定性提出了有力挑战,认为“战国策派”的观点虽有偏差,但是具有时代的意义,完全不足以被定性为“法西斯主义”。王敦书的《雷海宗与吴于廑——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杂忆数则》(武汉大学学报,1993,5)、《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雷海宗》(世界历史,1995,6)等开风气之先,对雷海宗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整体评价,并得出了与此前基本定性大相径庭的结论,认为“战国策派”的观点是在民族危机下思考中国文化出路的知识群体的代表性观点之一。温儒敏和丁晓萍的《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一书收录了“战国策派”的主要文化论著,值得重视的是《“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与重建构想(代前言)》,细致梳理了“战国策派”的“战国时代”重演论、民族文学的主张、文化重建思路等等,为从整体上把握“战国策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黄敏兰的《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出发,评述了“战国策派”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侯云灏的《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雷海宗早期文化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4,3)对文化形态史观的价值和缺陷进行了清晰的分析,并对雷海宗提出的中国文化的分期作了较为细致的剖析。雷戈的《论“战国策派”的历史警醒意识》(武陵学刊,1998,5)从“战国策派”对历史的警醒意识出发考察了这一派别。邵伯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将“战国策派”看作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认为“战国策派”的文学创作被定性为“美化汉奸”、“美化国民党特务”、“宣扬法西斯主义”的糖衣炮弹是不正确的,应该加以重新评判。

近些年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日趋成熟。如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较为全面系统地从各个方面分析论证了“战国策派”思潮,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对“战国策派”思潮作了重评,为“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翻案”,该书是近年来在“战国策派”的整体性研究中最扎实和丰厚的一个成果,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填补了学术空白。倪伟的《“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从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入手,探讨了文学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揭示了“战国策派”在这一互动关系中的价值。许纪霖、李琼的《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季进、曾一果的《陈铨 异邦的借镜》(文津出版社,2005),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的《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5)提供了林同济、陈铨和雷海宗较为完整的著述和生平资料,为他们的个案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果的出现,使我们对“战国策派”的认识更为深入,从而在整体上推进了“战国策派”的研究。

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活跃在大后方的一个重要文化派别,它产生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尚力”主义思潮并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观念,以关注人类文化命运、探讨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及其走向为宗旨。

本书的主旨是通过对“战国策派”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人思想的研究,挖掘“战国策派”的哲学思想,以基本史实为依据,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阐释“战国策派”在文化、政治、伦理等方面的基本主张,厘清“战国策派”被淹没于批判声中的极富个性的呐喊和在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为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构建提供借鉴。

本书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肯定“战国策派”的救国动机,重新衡量其移植西方思想的本意,反思批判其为法西斯主义代言和为国民党服务的定性;第二,还原“战国策派”的学术思想,排除旧有政治意识及

传统定性的困扰,将其从以往认定的政治思潮中剥离出来;第三,关注“战国策派”的学术价值,挖掘其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的探索,力求实事求是地展现“战国策派”的真实形象;第四,重视“战国策派”的伦理思想,肯定其在改造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的努力,通过分析“战国策派”对传统伦理的批判,梳理出“战国策派”伦理观的基本主张和现实意义。

四、本书的结构

本书除导论外,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为《“战国策派”的思想成因》。本章主要对“战国策派”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梳理,并对“战国策派”的理论来源和其主要成员的人生经历进行了分析。“战国策派”的产生是与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民族危机和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紧密相连的,他们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当时欧美十分流行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叔本华的生命哲学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以及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尚力”思潮。

第二章为《“战国策派”的宇宙观》。本章主要对“战国策派”的“力”的宇宙观进行了阐述。“战国策派”不仅把“力”作为宇宙的本原,还认为“力”是一切生命的表征,是一切生物的本体,赋予了其本体性的意义。他们明确指出,一个民族如果不了解,甚至于曲解误解“力”字的意义,必将走上堕落自毁的道路。

第三章为《“战国策派”的伦理观》。本章主要对“战国策派”的“大政治时代的伦理”进行了阐述。“战国策派”首先对中国历史上的家族形态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对大家族制提出了批判。同时提出了一种所谓的“大政治时代的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认为在当时的大政治世界必须提倡“忠为第一”,而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孝为第一”。他们还对“英雄崇拜”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证,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提出要将传统的缺乏活力的“柔道的人格型”改造成“刚道的人格型”。

第四章为《“战国策派”的文化观》。“战国策派”充分吸收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独

创性地提出中国文化独具“两周”论,他们指出当时已经是战国时代的又一次来临,我们要把握时机,充分利用抗日战争这一有效契机,重建中国文化的第三周。

第五章为《“战国策派”的政治观》。“战国策派”认为当时中国文化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大多数问题,实际上都是两千多年专制政治制度的顽疾所致,所以他们直接抨击沿袭了几千年的“官僚传统”,并将中国社会政治史的退化用“由大夫士到士大夫”八个字加以概括,认为“士”已经由“技术”的蜕变为“宦术”的,将汉代以后的政治特征概括为“无兵的文化”,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

第六章为《思想定位及评价》。本章主要是对“战国策派”的一个总结性评判。经过对“战国策派”各种思想的论述和分析,笔者认为“战国策派”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化学术团体,虽然有些观点与当局的一些宣传相吻合,但并非是一个有意染指政治的政治团体。从它的思想内容来看,“战国策派”也绝非是宣扬法西斯主义、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法西斯主义的代言人,而是一个力求为抗战服务、应对西方文化挑战、重建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团体。虽然“战国策派”的思想多有偏颇,但是从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出发,提出的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重建的理论构想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